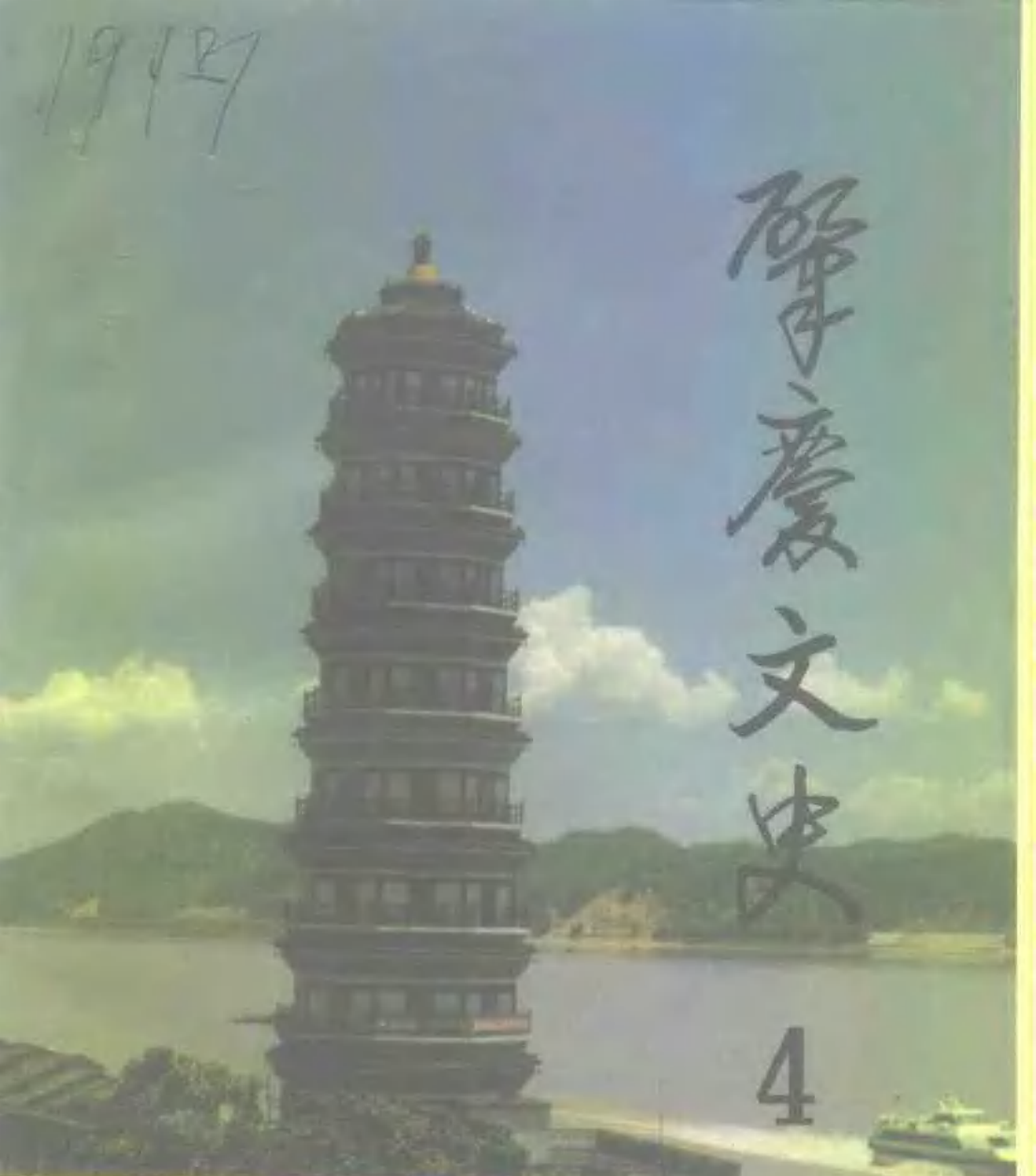


1997



肇慶文史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肇庆市委员会
肇慶文史資料編輯部編

1990.12

肇 庆 文 史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肇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月

主 编：丘 均

副主编：杨 锐 刘有庆 曹 特 赖志华

封面题字：吴南生

封面摄影：赖志华

肇 庆 文 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肇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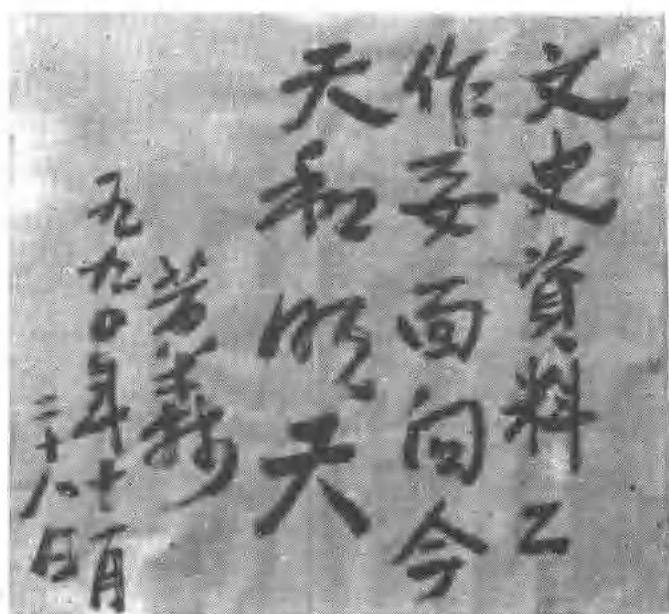
地址：肇庆市城中路49号

邮政编码：526040

850×1186大32开本 150000字

印数：2000册

准印证：90粤印准字第55号 工本费：3.70元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黄森
来肇指导工作题词

崇禧塔简介

崇禧塔位于西江河北岸，肇庆市区的东南部。该塔于明朝万历十年（1582）九月由肇庆府知府王泮主持动工兴建，万历十三年四月竣工。“崇禧”意为“文运兴旺、鸿福无疆”之兆。

崇禧塔为楼阁式穿壁绕座砖石塔，从塔基到巅峰高为 57.5 米；塔基高为 1.84 米，周长为 46.5 米。塔身呈八角形，外观九层，内分十七层。塔的建筑布局严谨，比例匀称，自下往上逐层高度递减，塔檐及平座的宽度逐渐收缩，游人可由西北方向的乾清门进入塔内，循级盘旋直至塔顶。每层向外伸出的塔檐用琉璃瓦铺盖，檐角悬挂铜质风铃共七十二个。

崇禧塔在建筑艺术上既保存了唐宋时期的塔型风格，又具有明代建筑的特色。它建成至今四百多年，经历水淹、地震、战火等灾害，但塔身无大异变，说明了我国古代人民对于力学、造型设计和材料选用等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60 年经修葺塔内各层梯级通道，粉刷了塔身；1983 年再次全面复原修葺。

崇禧塔是肇庆市著名的名胜古迹，于 1962 年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 录

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的人——刘泽荣	陈大同	1
我的祖父蔡廷锴	蔡醒民	4
斯诺谈“一·二八”淞沪抗日时的蔡廷锴	许建林	10
爱华关于蔡将军的述评		13
忆蔡廷锴往事	李如杰	14
忆“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中的蔡廷锴将军	陈祖荣	19
抗战时期高要县第一个飞行员——安家驱	苏广基	26
罗定县籍的革命烈士——唐木	卜穗文	28
澳门爱国同胞王作之	陈 明 阮如莉	32
我参加“四·一八”起义的经过	李荣开	35
“四·一八”武装起义之后	郁南政协文史组	40
都城保卫战回忆	李希文	52
日寇在金利的罪行	邓超槐	55
舰沉江底 丰碑永存	鲁 墨	58
政协广宁县委员会组织沿革	广宁政协办公室	61
罗定县人民政协史	罗定政协办公室	70
新兴县政协组织沿革	新兴政协办公室	75
政协封开县委员会沿革	封开政协办公室	78
政协四会县委员会沿革	谢文雄 冯碧天	83

古来谁不重端城	丘 均	96
肇庆爆城记	黎国庆	104
德庆史话	谢富崇	118
罗定豆豉业简史	崔 民	140
七根松杨桃	陈朴南 唐炎昌	144
历史上的包拯及其在端州的政绩	曾 特	146
砚洲包公楼	苏应荃 鲁 墨	152
大鼎古庙	罗维炽	155
宋之问贬泷洲	徐 东	158
晚清举人吴功补事略	陈宝潮 吴师高	162
莲塘公信围史话	赵沛如	165
水坑村史及其人物	李廷芳	167
凌十八义军在罗境战斗纪事	陈英林	172
岭南书画大师——吴子复先生小传	邵明耀	191
彭泰来传略	鲁 墨	198
四会县血吸虫病的防治	四会血防站	201
建国后西江地区第一次土特产展览	陈日辉	206
肇庆龟顶山的变化	陈 亮	209
鼎湖山世界稀有的特殊森林类型	陈 亮	212

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 共产国际的人——刘泽荣

陈大同

原籍高要县的刘泽荣，在中苏关系史上，从事过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产生过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影响。过去，他的事迹鲜为人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逐渐被揭示出来。但是，由于资料、信息和研究的限制，他的事迹至今还很不彰显，其中很多情况，细节还不清楚。为了交流信息，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特将刘泽荣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几年的活动作粗略的介绍，以便抛砖引玉，谱成篇章。

刘泽荣又名刘绍周，从小在俄国生活、读书直至成年，参加工作，可以说是一位俄国通。原来他的父亲刘峻周（原名刘兆彭），在1893年应俄国商人波波夫的邀请，远赴俄国高加索一带引种茶树和中国南方的其它作物，种植一举成功，在高加索一带迅速发展，开创了俄国的种茶史，受到俄国人民和政府的尊重、优待，直至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继续加以发展，今天的苏联已成为世界主要的茶叶生产国之一。刘峻周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刘泽荣的事业是从救济旅俄华工开始的。华工在十九世纪末大批进入俄国，二十世纪初人数骤增。1913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个欧洲主要国家急需增加劳动力，有二十万华工被运到了俄国。俄国的欧洲部分便有华工约十万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做

苦力，工作繁重，待遇却很差，环境十分恶劣。有些人被赶进沼泽地和森林里挨饿受冻，有些人身患重病得不到医治，个别人受刺激而精神失常。还有人无辜地遭受杀害。他们备受压迫、剥削和虐待，苦不堪言，无处申诉，有国不能回，有家归不得。当时年轻的刘泽荣正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读书，目睹同胞们的苦境，激起了救济之情。毅然创办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专事开展救济华工的工作。对希望回国的华工，在经济上、手续上提供帮助，使大批华工得以陆续回国，实现了守候多时的愿望。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整个俄国风起云涌，华工们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有些人参加了赤卫队，有的还在彼得格勒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刘泽荣也旗帜鲜明，拥护苏维埃政权。第二年，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大批华工又参加了红军，组成中国连、中国营、中国团，编入各个方面军，总数达四万多人，在各个战场上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军作战。12月，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等主要城市建立分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俄华工代表大会，刘泽荣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时他以崭新的姿态，参加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组织、领导四至六万华工支援苏俄，争取华工本身的权益。12月2日，华工们占领了彼得格勒射尔盖耶夫斯基街22号中国公使馆大楼，接管了全部档案。旅俄华工联合会将此事通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得到谅解。承认暂时由该会作为中国公民利益的代表机关，同月30日，莫斯科华工联合会举行首次会议，刘泽荣以主席的身份作了工作报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伏兹涅先斯基也到会讲话，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支持。第二年2月11日，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举行全会，刘泽荣代表旅俄华工联合会到会祝贺，在贺词中宣称：“实现不仅是西方无产者，而且也是东方无产者的国际誓言的

时刻已经到来了。中国工人愿意学习你们新的社会斗争方法，以便全部掌握它，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同时旅俄华工联合会发出呼吁书，号召国内同胞“继续进行反对卖国的北方政府的英勇战争”。相继在1919年、1920年举行的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二次、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上，刘泽荣都被选为主席。在后一次大会上，刘泽荣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形势。指出：“觉悟的中国大众正努力寻求使中国能够摆脱奴隶地位的现实道路。民众注目于久经考验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大会期间，建立了共产党小组。

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国内无从派代表，刘泽荣便就地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第二年，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他又参加了。他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又是最早同列宁见面的中国人。当时的知名度相当高，布尔什维克的大报《真理报》、《消息报》都刊登华工联合会活动的消息，称刘泽荣为刘绍周，刘同志，有时甚至称呼为中国广东的同志。从一系列的事实看来，刘泽荣实际上是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的宣传者、组织者之一。

1920年下半年，刘泽荣回国，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局任处长。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问题，刘泽荣任翻译，在促成中苏建交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任国民党政府新疆特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外交部顾问，同时从事俄文的翻译和中苏文化交流工作，曾编有《俄华大词典》，该词典，受到学术界推崇。

附注：本文参考了《关于旅俄华工参加和保卫十月革命的文件资料选译》，何振苏译，载《近代史资料》总六十六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第二研究室薛衡天同志的信写成。

（本文原载《高要文史》第五辑）

我的祖父蔡廷锴

蔡醒民

我的祖父蔡廷锴逝世于1968年4月25日，虽然祖父离开我们已有20年，但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他朴实无华的品格、严格治家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常激励着我。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一个勤俭朴实的老兵，一个严厉而慈爱的家长，一个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愿将往事的回忆奉献给读者，以缅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过重要贡献的祖父。

勤俭朴实的老兵

祖父于1892年出生于广东省罗定龙岩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6岁便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受尽地主豪绅的剥削，终日劳碌而不得温饱。18岁时离家赴省城入伍，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由士兵而升至十九路军军长、十九路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在“一·二八”事变中与蒋光鼐将军一起领导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入侵，写下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光辉的一页。

全国解放后，他在国家担任领导工作，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尽管如此，祖父没有忘记自己是穷苦人出身，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保持一种老兵的作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就在院子做体操，然后慢跑，有时还“一、二、三、四”边跑边喊，就像一个老兵。在协助贺龙主任负责全国体育工作时，他说：“毛主席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每当运动员打破纪录，取得好成绩时，他都无比喜悦。他常说：“运动员为国增了光，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我也要锻炼身体，多活几年，看看祖国更加强盛的面貌。”

祖父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对穷苦出身的祖先是十分怀念的。他的穿着很随便，总是布衣布鞋，只有出席重要会议及外事活动时才穿得好一些。他的饮食也很简单，除午饭有些鱼肉外，晚饭基本吃素，而且从不吃零食和夜宵。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弄些好菜庆祝一番。每当全家举杯之时，他总要对讲他年轻时一日三餐吃的是蕃薯粥，只有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才能吃些肉的往事。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在家里摆上鲜花，让我们与他一起祭拜祖先。对这种做法，我起初很不理解，后来，我看到祖父的一篇日记，才明白他的心事。他写道：“……清明前后这两三天，人民群众均往郊外扫墓，我家在广东而未能南归，只在京家中遥拜，这乃系后代敬仰祖先应有的心意。回忆我当年的处境，父母训导我长大应当很好做人；又说过‘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就是做人处世的道理……。”这才使我认识到，祖父是身居高位而不忘家庭的过去，其实就是不忘天下的寻常百姓。正因为如此，他始终保持了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从不摆架子，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喜欢和他聊天、下棋、打扑克。

他还保持着亲自动手的作风，有空就养花种菜，而且还要我和司机、警卫员在院子内挖坑积肥，种了很多丝瓜、冬瓜、南瓜等，有一年我们种的一个冬瓜竟有 50 多斤重。每当我们种的瓜菜丰收了，祖父就十分高兴。他说：“我是农民出身，以前没有土地，为了糊口要给地主打工。抗战胜利后，我在香港新界种田，是不愿做蒋介石的官，对蒋打内战不满，宁可在香港新界种田掩护爱国民主运动。现在年岁大了，工作也忙，但在院子种些瓜菜，作些体力活动，心情舒畅，生活充实有意义。”他要求我们“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当大少爷”。有时他还亲自下厨，教我如何宰鸡、鲷鱼、做饭菜。他常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各项工作，是为了使我们国家强盛起来，尽自己一份力量。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这是来之不易的，要使全国人民丰衣足食，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

严厉慈爱的家长

我是在祖父身边长大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就离开父母，来到北京读书了，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离京工作前，我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他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爱的长者。尽管祖父工作十分繁忙，社会活动又多，还常常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但对我的学习生活却极其关心，我读初中时，他还去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议。他对我要求相当严格，总希望我能学有所成。他常对我说：“我从小家境贫困失学，为求一饱才离家当兵，为国家、为民族参加革命是后来逐步认识的。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国家的统一强盛是我多年的愿望，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本实现了。你们生活在这样好的时代，就要努力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才是！”

1958年，我参加高考，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我当时并未报地质专业，思想有些不通。正在疗养治病的祖父知道后，特意要我到疗养院陪他几天。在这几天里，他再三教育我要服从分配，并现身说法说明他过去从未想过能上大学。他教育我，中国这样大，还有很多未发现和未开发的宝藏，学地质是大有前途的，同时到野外接触实际、接触老百姓，对自己是很好的锻炼。经过他的教育，我开始了地质学院的生活。

进大学后，正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祖父一再嘱咐我要正确认识当时的社会形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农业生产“放卫星”的事。入学才几天，我们就在学校种了一块地，也提出了亩产万斤的指标。祖父知道后说：“你们没有种过地，一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千多斤就了不起了。”他又一再告诫我：“你太年轻，不要事事好胜，做人处事主要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当不上先进我不会怪你。”

1963年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山东省水利部门的地质队工作。我当时很想留京守在祖父的身边，但祖父却不希望我这样做。离京前，祖父对我说：“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现在毕业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前几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你们讲了话，你们要按总理的教导去做。山东离北京不远，一夜火车就到了，有空可以回来看我。我虽年已古稀，但心情舒畅，身体很好，现在国家一切走上正轨，有组织照顾，你也不必挂心，放心去工作吧！”

在山东期间，我经常收到他老人家的来信，他总是勉励我要做出成绩，同时要注意身体。还说有机会一定来看我。其实，祖父何尝不想我留在他身边，只是他把服从国家分配放在第一位罢了。

实事求是的革命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祖父已是74岁高龄了，又患了动脉硬化和白内障，这时，他的一切社会活动基本停止了。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听到蒋光鼐的家被红卫兵查抄了，很生气，心情极为沉重。他看到街上“破四旧”、“砸狗头”的大字报，很不理解。不久，家里也来了红卫兵，幸亏敬爱的周总理及时加派了公安人员，对我家进行特别保护，才使祖父免受冲击。

当时我在济南，十分挂念祖父，1967年春节前，我写信告诉祖父，准备回去看看。但祖父却回信叫我好好学习，没有特别的事情就不要回北京。直到1968年春节，我才回到北京探望他。两年不见，他老人家身体已大不如前，视力极差，据工作人员说，祖父终日闷闷不乐，总是在房子内踱来踱去。我回来后，他就拉着我坐到他身边，问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说：“我们那里都成立造反组织，分了几派，我们还参加单位夺权呢！”他听后问我：“那有什么用？”我说：“那是夺走资派的权，你不懂。”他说：“我是不懂，但世界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我18岁当兵，十年后才当上排长，又过了五年才当上连长。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脚踏实地是办不成大事的，光叫喊不生产，吃什么呢？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我希望你将来无论干什么都不要做过头的事。”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对我的教导。当我返回单位后两个多月，就接到祖父因肺炎住院的电报。我急忙赶回北京时，祖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我在医院侍候他十多天，祖父终于在那动乱的年代默默地离开了我们。

时间一晃，祖父离开我们20年了。20年以来，我国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最近终于冲破了三十八年的人为阻隔,部分台湾同胞可申请回大陆探亲。祖父在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感到无比欣慰。我要更加努力工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对祖父最好的纪念。

(本文原载《罗定文史》第十一辑)

斯诺谈“一·二八”淞沪抗日时的蔡廷锴

许建林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目睹了1928到1949年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其中，他对“一·二八”淞沪抗战非常关注，对战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作过详细的记述。本文就斯诺对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将军的二次采访作个简单的介绍。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守军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午后，斯诺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指挥部所在地——真茹一间小茅屋采访了他。斯诺当时是这样描述自己对蔡将军的第一印象的：“身高六英尺，面孔黝黑而土气，四十岁看上去像三十岁，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却穿着没有勋章饰带的普通草绿色军服。厚嘴唇、大嘴、塌鼻子。他身子最富表情的东西是手指细长的大手、以及活泼而敏锐的栗色眼睛。”斯诺还特地补充说：“此时蔡将军的眼睛闪耀着愤怒。”

蔡廷锴将军对斯诺说：“这个野蛮的盐泽（日本海军总司令）破坏了一切国际准则，在这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里违反了起码的人道原则。”当斯诺问到蔡将军是否准备撤退时，蔡明确地回答